

The Tragedy of Women under the “Divine Power” of Moder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lessings*

Xinru Zhou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Blessing was written on February 7, 1924, and published on March 25, 1924 in Shanghai *Oriental Magazine*, Volume 21, No.6, and later edited into the story collection *Hesitation*. It is a tragic story about the death of an ordinary woman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under various factors, but different from other female tragedies in modern novels,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ocracy” among the “four powers”. Sometimes people attribute the tragedy of Xianglin’s wife simply to the feudal ethics, but ignore the religious culture hidden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in the novel. Therefore, the author will base on the analysis of *Blessing*: the tragic shaping of Xianglin’s wife, the religious elements in the novel, the religious character of Xianglin’s personal identity and the influence of *Blessing* on modern literature.

Keywords

Blessing; modern literature; female tragedy

从《祝福》看现代文学“神权”下的女性悲剧

周芯如

香港大学, 中国·香港 999077

摘要

《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 于1924年3月25日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6号上发表, 后编入小说集《彷徨》。是关于一个普通的社会底层女性在多种因素导致下走向死亡的悲剧故事, 但是与其他现代小说的女性悲剧所不同的是, 小说对“四权”中的“神权”有所侧重。有时人们把祥林嫂的悲剧简单归结于封建礼教, 却忽略了小说中暗藏的时代背景下的宗教文化。所以, 笔者将立足于《祝福》分析: 祥林嫂的悲剧塑造, 小说中的宗教元素, 祥林嫂个人身份体现的宗教性以及《祝福》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

《祝福》; 现代文学; 女性悲剧

1 悲剧成因的分析方向

祥林嫂的悲剧成因可以分为天灾和人祸。自然因素是不可控的, 比如她的第一、二任丈夫意外去世, 她的孩子被狼叼走。而人为因素可以从社会特点, 人的助推来分析。

从社会特点分析, 可以认为祥林嫂悲剧的成因是: 政权、夫权、神权、族权。这“四条绳索”在农民祥林嫂一人的身上尽数体现。而“封建社会吃人论”则是封建绳索的“外显”。

从人的助推分析, 悲剧性主要是“无主名无意识”^[1]的杀人团导致。“这一谋杀案没有真正的被告和凶手, 因而全部是被告和凶手”^[2]。作为祥林嫂的周边群众, 虽然同样是受剥削阶级, 但是他们却仿佛视她为敌人, 用统治阶级的观念审视、责备着她。这种同阶级却敌我不分的现象也同样

出现在《阿Q正传》。

2 以格雷马斯六动素模型分析悲剧塑造

俄国著名的形式理论主义学家弗拉基米尔·普罗普在《俄罗斯民间故事研究》中总结了小说的固有角色, 他们分别是英雄或受害者、施惠者、帮手、公主, 或要找的人和物、派遣者或发出者、假英雄。而法国语言学家格雷马斯又进一步总结, 提出更具有普适性的叙事分析模式——格雷马斯的六动素模型。

六个行动要素, 形成三组二项对立。它揭示了叙事文本的内部结构, 构成了叙事功能上的对立^[3]。最重要的第一组动素是主体——客体; 第二组动素是发出者——接受者; 第三组动素是帮手——敌手, 帮手帮助主体实现目标, 敌手阻止^[4]。

文中祥林嫂就是主体, 先前的客体或许是她能靠自己的勤劳生活, 过上平淡又充实的日子, 但是被敌手——婆家

【作者简介】周芯如(2001-), 女, 中国山东济南人, 在读本科生, 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

人破坏了，又被疾病和狼破坏了。之后的愿望是捐条门槛，能赎清自己的罪孽，不被阎罗锯开，但是又被柳妈和四婶破坏了。

鲁镇就是儒家思想和现代秩序的融合。有知识分子，有农民，没有官员，矛盾主要是在同阶级的人之间展开的。鲁四老爷是“乡绅”、带点愚昧的旧知识分子，儒道兼有。“我”是思想先进的新知识分子，但是“我”有知识无权利，鲁四老爷有话语权却思想陈旧。所以，“我”不仅是叙述者——总是以游离和批判的眼光看待他们，“我”还是需要被观察的对象。

柳妈既是农民，又是女人，从两个方面给祥林嫂带来影响。她信仰佛教吃素，“然而柳妈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5]。但是她的态度和行为都与佛教的观念所背离。她并不善待人，不以慈悲为怀、同情他人苦难，“‘祥林嫂，你又来了。’柳妈不耐烦地看着她的脸。”“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盯住她的眼。祥林嫂似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6]她幸灾乐祸，言语直戳女人痛处，同时还对女人的私人生活有着变态般的揣测与窥探。

鲁迅说：“眼光不远，加以‘卑怯’‘贪婪’柳妈表面上看是帮手，实则是敌手。”看似认真地出主意给祥林嫂，教她如何才能洗清这一世的罪名，死后不必受苦。实际上柳妈只是把祥林嫂和祥林嫂的苦难当做笑话，把她当做谈资。最终导致祥林嫂鼓起的希望更为彻底破灭，使她没有了活着的寄托，将她推入深渊。一个信佛的人竟然间接造成一个很苦很善良的人的死亡。她只遵从佛教的形式要求，但是没有真正表现出佛教的精神。

祥林嫂实现愿望的过程中，没有助手，只有数量庞大的杀人团作为对头，那希望落空似乎就变成必然。于是在一系列的意外而特殊的经历下，祥林嫂无可挽回地滑向悲剧结局。鲁迅通过这些悲剧的经历的设置，引出她“在悲剧降临到自己时”真实的反应，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的真实。

按照模型，如果结尾成功达成了主人公的目的，即使中途遇到困难，整个故事也呈现了一定的喜剧效果。但祥林嫂是在幸福和苦难交替出现中走向悲剧，每当她的日子渐渐回归正轨，意外都会突然发生，使她重回痛苦。而且这些意外有些离奇——在现实中发生概率比较小，但它们偏偏都发生在祥林嫂的身上。这似乎也体现了，苦难，才是生活的常态。

3 祥林嫂与“神权”

“神权”在中国，基本体现在佛教、道教、儒教。而这三个因素在小说中皆有出现。前面已经论述了其他人的宗教性，此处着重关注祥林嫂。

妻要从夫，从婆婆；丈夫死了要守寡，再嫁有罪，败

坏风俗，沾了手的祭祀饭菜会不干不净。这都是儒教的思想或者延伸。在小说里鲁迅先生写道：“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鲁迅所写的，大多是儒教不好的一面。

这里所说的“妻性”是“以夫为纲”主观服从的妻性，是“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妻性。对于妻性的强化，也是女子自我的丧失，是个人意识的残缺。

祥林嫂就是被迫嫁给第一任丈夫的，虽然小说中没有言明，但是从“她是逃出来的”，以及她和老公差了十岁，可以隐约得见。她在家需要服从精明的婆婆，她的日子过得不好，没有地位，没有自主性。比如她婆婆的行为：把她的钱取走、找人一起把她绑回去、不顾她的意见把她当作赚钱的工具。第二任丈夫也是被逼迫的，所以她对再结婚的反抗，除了不愿“夫死再嫁”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愿意嫁给一个陌生人。这是对自由和个体性的争夺。只有逃出来靠自己干活来养活自己，过上充实的日子时候，她才“反满足，口角边渐渐地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小说里“形骸”“尘芥”“无常”都是佛教词汇。而这种佛学词汇的融入，似乎也体现作者正在用佛教的思想解释一些关于生死的现象。

祥林嫂曾提出三个问题：

- ①“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 ②“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 ③“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这三个问题，顺序不可变更。第一个是“是与否”的问题，而第二三个则是带着答案的疑问，像是祥林嫂的自言自语。穷途末路下，对家人团聚的思念甚至压过了对阎王锯身的恐惧。其实地狱的概念并不是儒家本土产生的，是印度佛教流传来的。李欧梵发现：“她向‘我’提出的问题是迷信出发的，却有一种奇怪的思想深度的音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虽然话语权不足，但面对鲁四老爷等人都是审视的自信态度，在面对已经变成乞丐的祥林嫂，却“吞吞吐吐”“悚然”“惶急”，姿态大变。或许是对“宗教并不能带来宽慰，反而造成苦难”真相的惶恐，或许是自诩无神论知识分子却无法解答祥林嫂的问题的逃避。鲁迅本人与宗教联系甚密，“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

祥林嫂的故事情节塑造和形象或许也与佛教有关。鲁迅1908年在《河南》杂志发表的《破恶声论》表明他“开始表现了对佛教的积极的兴趣”。鲁迅日记1914年7月4日记载：“午后赴留黎厂买《四十二章经等三种》一册，《贤愚因缘经》一部四册。”又同月29日日记：“上午寄二弟书籍三包：《贤愚因缘经》四本……”鲁迅购买此书并将它推荐给周作人共赏，可见他是很喜欢《贤愚因缘经》这本佛经的。这本佛经里面有一篇描述女性苦难的故事，叫《微妙

比丘尼》，主人公名叫微妙。微妙和祥林嫂经历相似：丈夫病死，儿子被狼叼走，最后想通过佛教获得解脱。架构也有相似：《微妙比丘尼》开头是微妙劝诫其他比丘尼，从而引出前世经历，而《祝福》是“我”听到“祥林嫂”死讯，引出祥林嫂的一生经历。都采用倒叙手法。

微妙祥林嫂故事框架对比如表1所示。

表1 微妙祥林嫂故事框架对比表

作品	《微妙比丘尼》	《祝福》	作品
人物	微妙	祥林嫂	人物
开端	微妙规劝比丘尼引起对自己身世 的回忆。(倒叙)	在“祝福”的气氛中,引起我对 祥林嫂的回忆。(倒叙)	开端
故事发展	第一次嫁人,丈夫被毒蛇咬死, 大儿被大水冲走,小儿被狼叼走。	第一次嫁人,丈夫借死, 出逃。	结局
	第二次嫁人,丈夫将要儿吊死, 出逃。		
	第三次嫁人,丈夫暴病身亡, 微妙殉葬,故道婆者救出。	第二次嫁人,丈夫暴病身亡, 儿子被狼叼走。	
	第四次嫁人,丈夫被刺杀,微妙 殉葬,豺狼扒墓,死而复生。		
结局	向佛庙求得批,皈依佛门,获得 新生。		

4 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鲁迅作为冲在前锋的反封建礼教的作家，作品相当具有国民批判思维，同时也与女性相关。他之后的一部分作家也延续了他的观点，关注女性故事与地位。对女性特殊处境和故事的书写也有利于启发女性以及提升女性地位。

比如萧红在《呼兰河传》中讲述了一个恶婆婆虐待媳妇的故事。我们从情节入手，可以发现这也是一个悲惨女人在“四权”下走向死亡的故事，着重关注了“族权”和“神权”的影响。

“族权”在此处主要体现在家庭里婆婆的核心权威，其他人皆在婆婆的管教之下。团圆媳妇刚来的时候人高马大、吃得多、不怕羞，不符合婆婆心中传统的做媳妇的“规矩”，婆婆为了立规矩而打她，等她伤好后接着打。在反复殴打中，团圆媳妇说要回家，回家在婆婆看来是不祥的，请了一个圆梦的一算，原来回家是回阴间地狱的意思。之后挨打时团圆媳妇的挣扎在婆婆看来也像是着魔。邻居来出主意，又是萨满文化的跳大神，又是各种偏方。团圆媳妇终于在族权与神权的作用下走向死亡。

而团圆媳妇刚来的时候、跳大神的时候，总是吸引一

众人观看。这又和鲁迅笔下的国民的看客心态有所联系。萧红对跳大神这个民间习俗进行描述，她说神婆“每一打颤，就装出来要倒的样子。把四边的人都吓得一跳，可是她又坐住了”一个“装”字，将信徒心中的神圣仪式戏谑化，直接地表明她对该文化的态度。

在《祝福》中分阶段地出现了祥林嫂的脸色描写，丈夫死后偷跑来做工——儿子死后没房子走投无路来做工——失去活着的动力后成为乞丐，三个阶段。《呼兰河传》中，在不同的折磨程度下，也阶段性地出现小团圆媳妇的脸色描写。“她的脸长得黑乎乎的”到“那小团圆媳妇，有点黄，没有夏天她刚来的时候，那么黑了。不过还是笑呵呵的。”再到“哭也不哭，笑也不笑。满脸的汗珠，满脸通红，红得像一张纸。”

这个婆婆类于《祝福》中的精明的婆婆，都身为女人却处处为难媳妇，以自我和自家孩子为中心，剥夺媳妇的人权。两个小说中涉及的各种驱魔方法类于祭祀，都导致主人公的死亡。而出偏方的邻居们和出主意捐门槛的柳妈，是主人公经历的旁观者，看似帮助，实则助推主人公死亡。

5 结语

封建时代的女性悲剧由多因素导致，而《祝福》特殊在强化了“神权”的影响，对儒家道家佛家的社会积习有所表述。鲁迅对这种“神权”的批判以及对“神权”带给女性悲剧命运的反思，也深深地影响了一些作家。作为当代读者，我们也可以带着新时代的眼光看待这些女性悲剧故事，从而感受那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时代。

参考文献

- [1] 孙红震. 闪回:叙事主体内省的彰显——对鲁迅《祝福》的再解读[J]. 名作欣赏, 2006(20):19-21.
- [2] 叶隽, 黄剑波. 《祝福》中的“宗教潜对话”——一个宗教人类学的文本解读[J]. 思想战线, 2007(1):99-108.
- [3] 唐东堰. 乞讨虚无:《祝福》与鲁迅生存困境的自我体认[J]. 东岳论丛, 2011, 32(1):79-82.
- [4] 宋剑华. 反“庸俗”而非反“礼教”:小说《祝福》的再解读[J]. 鲁迅研究月刊, 2013(11):18-28.
- [5] 杨鑫. 《祝福》的存在主义美学阐释[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1(4):118-128.
- [6] 彭小燕. “虚无”四重奏——重读《祝福》[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2(1):185-198.